

台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 (1937 - 1945 年)

許進發*

現今帝國對南方的關心逐漸提高，南方政策的適當與否，若言在所謂東亞共榮圈的確立上關係其消長，也非言過其辭。特別是本島和南支南洋方面，在自然和人文各範疇，學術上的研究資料所在多有，蘊藏有待開發的諸多富源。從而考察此等方面之時，台北帝國大學負有重大特殊使命一事，自不待言。

——1941年3月24日 台北帝國大學總長三田定則在畢業證書授與典禮時的祝賀辭

壹、緒言

戰前日本在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地區所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台灣有台北帝國大學、韓國有京城帝國大學、滿洲有旅順工科學大學和滿洲醫科學大學等等，各有其學術研究特色。就中京城帝國大學在1924年創立之時，即標榜韓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諸如在法文學部史學科下置朝鮮史學講座，文學科下置朝鮮文學和朝鮮語學二講座^①。且以韓國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助理。

^① 參閱京城帝國大學，《昭和十一年京城帝國大學一覽》，京城：京城帝國大學，1936年。

鄰近滿洲，成爲日本對亞洲大陸前進的據點。是以京城帝國大學當局遂在 1932 年組織「滿蒙文化研究會」，專責學術的調查研究和知識普及，至 1938 年因應時局的發展而改稱爲「大陸文化研究會」。爾後不僅組織蒙疆學術探險隊，更陸續出版以滿蒙文化和大陸文化爲名的研究報告書^②。京城帝國大學以其所在和地緣位置，展現其朝鮮文化和大陸文化研究的存在價值。

其時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各有一所帝國大學，且各居帝國的邊陲地帶。相對於京城帝國大學在帝國版圖的北方邊陲所扮演的角色，則 1928 年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台北帝大）在帝國版圖的南方邊陲則又扮演何種角色？

台北帝大設立之後，一方面以學術研究機構面貌，製造學術研究產品；另一方面以高等教育機構面貌，培育專門人才。如就其時台灣的學術研究情景而言，日治時代台灣的研究機構屈指可數，中央研究所^③雖爲專門研究機構，由於是以殖產興業爲目的的產業科學研究機構，因此以農業、林業、化學、衛生等方面的研究爲主，研究對象專以台灣事物爲主。相對於此，台北帝大固然爲高等教育機構，也兼負學術研究之責。然其自然、人文等學科並設，就某種意味而言，可稱爲綜合研究機構。又台北帝大設立之後未幾，1930 年代即有數個學會在台北市舉辦全國性大會，而台北帝大的各相關學科爲主辦單

② 京城帝國大學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誌編集委員會，《紺碧遙かに——京城帝國大學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誌》，東京：京城帝國大學同窓會，1974 年，頁 181 - 185。

③ 該所的前身爲 1909 年設立的台灣總督府研究所，1921 年合併農業、林業等各研究機構而成立。1939 年因應時局和發展的需要而解體，但所轄工業部、衛生部、農業部和林業部等各研究部門則獨立而出，且擴充爲工業研究所、熱帶醫學研究所、農業試驗所和林業試驗所等研究單位。

位，其中以醫學關係為多^④，此種事情顯示台北帝大對台灣的學術研究引進活潑的氣象。故台北帝大在近代台灣學術研究史上，實具有其重要位置。

台北帝大雖在近代台灣學術研究史上有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但究其源流本質則為殖民地大學。殖民地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向與殖民母國有其異樣的發展取向和模式，近代台灣的學術文化面向在殖民地政府的有形無形的政策導向之下的發展，自有其特殊性、局限性和區域性。台北帝大的學術發展面貌，處於此種歷史現實的條件之下，以其地理位置之緣故，遂有其「南方熱帶」的特色。

回顧歷來相關研究文獻，即知台北帝大的學術研究面貌，向來是在台灣研究為主體的學術史脈絡中論述，其中主要是在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個別專門學術領域中探討，以簡明扼要的筆觸，點明台北帝大的學術研究在相關領域中的重要位置，諸如平埔族研究方面有翁佳音和張隆志的作品^⑤；體質人類學和蛇毒研究方面有劉麗娜的作品^⑥；原住民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面有馬淵東一和清水純的作品^⑦；

④ 諸如 1932 年的日本動物學會、1934 年的日本遺傳學會總會和日本學術協會、1939 年的日本藥理學會、日本聯合衛生學會、日本民族衛生學會和日本生物學會總會等活動。

⑤ 翁佳音，〈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莊英章主編，〈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 年，頁 49 - 67。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台灣——一個清代台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91 年，頁 3 - 5 和 53 - 57。

⑥ 劉麗娜，〈台灣科學的一種開始及其轉折——體質人類學及以蛇毒研究發展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⑦ 馬淵東一，〈高砂族に關する社會人類學〉，《民族學研究》18 卷 1、2 號，1954 年 3 月，頁 86 - 104；清水純，〈台灣〉，末成道男編，〈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年，頁 59 - 63。

語言學研究方面有淺井惠倫的作品^⑧。近年始有以台北帝大自身的歷史、制度、特色等為主題的研究出現^⑨。在此一情景之下，由於未見其向為人所知的「南方研究」主題出現，因此筆者不揣淺陋，擬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之上，爰就零散資料，試就台北帝大在其時帝國知識版圖的南方疆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述其「南方研究」的特色、內容和活動。

貳、學術研究基調

台北帝大創設^⑩之時，其基本學術發展特色，根據伊澤多喜男總督的構想為：

台北大學應見的特色，在文政學部方面有其他大學未見之例，以南洋史學、土俗人種學為最。如心理學也以民族心理學為重；語言學也取東洋、南洋為教材；倫理學也打破向來偏重西洋倫理學的型式，特別安排東洋倫理學。又其他大學名稱為支那哲學或支那文學者，改稱為東洋哲學或東洋文學，期注意及於東洋全體性。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也同然，與其取西洋為教材，無寧著眼於東洋之事例，又使東洋倫理學為政學科之一學科。至於理農學部，全以台灣為中心，以熱帶、亞熱帶為對象進行探究，內

⑧ 淺井惠倫，〈台灣言語學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民族學研究》18卷1、2號，1954年3月，頁12-19。

⑨ 諸如法學研究，參閱陳昭如，〈初探台北帝大政學科的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2號，1997年4月，頁13-68。

⑩ 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緣起，參閱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台灣近代史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1991年再版，頁149-175。

容與其他大學有所差異，自不待言^①。

由以上的敘述得知，大學學科的內容和名稱，一方面配合大學所在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因應時況展現東洋綜合研究的意味，俾能顯示大學的特色，其中最值得注目之事是以南洋和台灣的事物為對象的研究，比如南洋史、熱帶農業、熱帶林業等方面的研究。此外由於學校的規模所限制，或者規劃所導致，諸如心理學和語言學方面，頗有就地取材之特點。即使文學、哲學、倫理學方面，亦擴大以東亞地區的材料為主要研究內容。此種構思顯示大學所在的區位性，標明區域研究特色，從而可見與日本內地帝國大學相異的發展之道，且亦顯示因地制宜的折衷特色。

此種規劃內容的方向和特色，更能由台北帝國大學首任總長幣原坦的言論加以印證。由於幣原坦是將伊澤總督的構想予以實現的重要人物，其在 1926 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名為〈台灣の學術的價值〉，不啻指出即將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發展的方向及其重要性^②。文章開頭即指出北方文明的研究日漸興盛且有所成，但南洋的研究卻猶未著手。南洋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對日本國民的未來發展方向，能提供資料方面的參考價值，可謂具有時代性的要求。至於南洋研究最適合的地方，就是台灣。其所申述的理由為：

台灣為日本領土中向南洋踏出一步的立足點，且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皆顯示莫大的價值。台灣一地跨向熱帶，而在垂直

① 伊澤多喜男傳記編纂委員會，《伊澤多喜男》，東京：羽田書店，1951年，頁158。

② 幣原坦，〈台灣の學術的價值〉，《台灣時報》85號，1926年12月，頁25-34。

面向方面，不僅是溫帶，更延伸至寒帶。因此就某一方面而言，在植物學、動物學、醫學、氣象學和其他各種的自然科學研究，成爲提供世界罕例的良好對象。

更由水平面向觀察之，東有太平洋和居住其間的民族，由西向南，有錯蹤於南支南洋之間的民族。台灣介於此等民族之間，包容諸種文化。且日本國民在此地域立於開發地位，進行學術研究而觀察之，就中產生與上代舊友邂逅之感。因此台灣在民族學、語言學、文學、史學和其他方面的諸人文科學的研究，亦提供難得的良好對象^⑬。

爾後再以語言和歷史的事項爲具體之例證，以解釋其論點。幣原坦實自台灣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著眼，申述台灣的學術價值。對於向來以亞洲大陸爲中心研究的學界而言，台北帝國大學設立一事，正標示學界對南洋研究之類新學術領域的開展和期待。由於幣原坦此論所及之處，全然以台灣的立場言之，因此所謂的台灣學術研究，顯然是將台灣置於日本版圖內的南方知識研究中心的位置，展開涵括台灣和南洋在內的學術研究，提供學界對熱帶區域在內的南方事物的認識，此即台灣特有的學術價值。

迄至 1928 年上山滿之進總督在台北帝大開設的聲明中，公開宣布台北帝大的使命爲：

固然雖以鑽研一般科學爲目的，發揮東洋、南洋的相關特色爲要，以此釐清台灣的地位和沿革。人文科學特以東洋道德爲骨

^⑬ 前引文，頁 26。

髓，致力於文明的顯微闡幽，自然科學是論究熱帶、亞熱帶的特異事物和現象^⑭。

關於台北帝大未來的學術研究特色，上山總督對新聞媒體明言，大學理所當然應具有台灣的特色，文政學部以東洋、南洋有關學術研究為主，理農學部則以熱帶和亞熱帶有關研究為主^⑮。

因此台北帝大由構想至成立的學術研究理念定位，在人文科學方面為東洋和南洋事物的研究，其中東洋研究向為日本學術界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南洋研究則屬新興學術研究領域。在此種情況之下，以地利之便緣故，南洋研究自然成為台北帝大無以類比的學術研究內容。在自然科學方面為熱帶和亞熱帶事物的研究，由於台灣為日本帝國位於熱帶的唯一領土，熱帶研究自然亦成為台北帝大無以類比的學術研究內容。簡而言之，台北帝大設立時的主要學術特色，一為南洋研究，另一為熱帶研究。

如就台北帝大在 1928 年初成立時的講座內容予以考察，大學的規劃不僅體現伊澤多喜男總督的構想，且印證幣原坦總長的說法，具有南洋學術研究和熱帶學術研究的特色。譬如在文政學部設有南洋史學、土俗學人種學和心理學等講座^⑯。理農學部則設有農學·熱帶農

⑭ 上山滿之進，〈台北帝國大學開設に關する宣明書〉，《台灣時報》103 號，1928 年 6 月，頁 3。此一說辭與台北帝國大學學術研究定位送審時的說明書的基本內容，相差無幾。參閱「說明書」，昭和 3 年（1928）3 月 16 日，〈台北帝國大學學部ヲ定ム〉，《公文類聚》2A-12-類 1659，國立公文書館藏。

⑮ 《台灣日日新報》10020 號，昭和 3 年（1928）3 月 16 日，〈眞に特色あるノ大學にしたいノ上山總督談〉。

⑯ 陳偉智，〈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頁 8。

學講座，專業範圍為農業經濟學、園藝學^{①⑦}。其中土俗學人種學講座和製糖化學講座，更為其時日本各大學絕無僅有的設計。整體而言，台北帝大由於是殖民地綜合大學，固然因地理位置之故，以南洋學術研究為其主要標榜特色，另一方面也考量增進現地產業的發展，顯示學術和殖民地問題研究的關係。譬如農業方面的相關學術研究即是顯例，當時台灣的產業是以蔗糖和米為中心的農業而聞名，因此學術研究配合現地產業發展，置重點於農學，以農作物品種改良和增產為目標，提供充足的食糧和工業原料，乃為符合其時殖民地產業發展方針之事^{①⑧}。

因此台北帝大的學術研究內容，以其構成層面而言，或有「南洋研究」和「產業科學研究」二種特色。由表 1 台北帝大成立之初所設講座見之，或能略證上述之學術特色。就「南洋研究」而言，南洋史學講座無庸贅言，至於農學熱帶農學講座，以研究對象的區域言之，或可比擬。另就「產業科學研究」而言，農學熱帶農學、農藝化學、農業工學、農產製造學、製糖化學、植物學、植物病理學、應用菌學、昆蟲學養蠶學、氣象學等和農業發展有關的講座，實為最佳註腳。

①⑦ 李文良，〈理農學部——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頁146。

①⑧ 台北帝國大學設立之時的1928年，台灣的總生產額為5億5584萬圓，其中農業產值為54%，工業產值為38%，但工業產值的六成屬於由農產加工食糧品工業性質的砂糖生產所構成。因此對於當時台灣最大宗產業的農業和農產加工業而言，最不可或缺的學術研究即為農學。參閱東嘉生，〈統制化以前の台灣經濟〉，收入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昭和十六年版台灣經濟年報》，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1年，頁91。

表 1 1928 年台北帝國大學開設時的講座¹⁹

學部	講座名	稱	總數
文政學部文學科	國語學國文學、西洋文學		2
文政學部政學科	憲法、行政法、經濟學、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		5
文政學部史學科	國史學、東洋史學、南洋史學、土俗學人種學		4
文政學部哲學科	哲學哲學史、東洋倫理學西洋論理學、心理學		3
理農學部	農學熱帶農學（農業經濟學、園藝學）、農藝化學、農業工學、農產製造學、製糖化學、植物學、植物病理學、應用菌學、氣象學、動物學、昆蟲學養蠶學、生物化學、化學、地質學、物理學、數學		16

參、南方的調查研究活動

台北帝大成立之後，雖以南方研究為特色而標榜，且有優異研究成果出現。但自 1937 年起因應時局之需而逐漸展開的南方研究風潮中，台北帝大累積的研究成果不免面臨檢討和展望的情境。1930 年代的研究情況和 1940 年代前半期有待研究的問題，在檢討言論中紛然而出。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在台北市主辦的一場「南方開發的研究」座談會，由於是以楠井隆三等台北帝大學者為中心進行的討論會，正提供台北帝大學者自身對南方（即東南亞）調查研究的回顧和展望。與會學者認為台灣的研究成果，在技術和自然科學方面有極大收穫，而在文化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則有所不足，即使岩生成一、移川子之藏、淺井惠倫等人的研究成

¹⁹ 參照《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

果深獲肯定，整體仍有欠平衡。至於東南亞的問題，則論及民族、農產資源、林產資源、開拓人員養成、南洋適應、瘧疾、熱帶生活、混血兒、南洋歷史研究、日語教育、移民等等範圍^①。爾後座談會主辦單位的坂本德松（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調查課長）在報紙《都新聞》發表〈台灣の南方研究〉一文時，也認為台灣的南方研究活動，在自然科學或技術方面的研究極為進步，相對於此，政治、經濟、社會等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除南方土俗和歷史學等特殊者之外，其餘呈現落後狀況^②。

此一座談會的背景顯而易見地與其時日本對南方政策的實施有關，東南亞地區各種現象和事物等的調查研究，成為刻不容緩之事。因此討論焦點係基於對東南亞地區多方面認知的需要，諸如政治、社會、經濟、種族、宗教、風俗習慣、產業、地下資源等等範圍。如就台北帝大的學科構成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方面，與東南亞研究有關者，僅有南方史學、南方民族學和南方語言學等二三學科，其餘學科則向無關係。因此以 1930 年代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規模和設施所具有的處理範圍和能力，應付 1940 年代時局所需，不免產生不敷時局所需的窘境。且 1930 年代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領域中，東南亞研究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內容。

台北帝大在 1930 年代對南方調查的限制，必須考量下列因素：

- 第一、台北帝大本質為高等教育機構，並非專責的調查研究機構。
- 第二、台北帝大的研究構成層面，重心在農業等自然科學方面。

^① 坂本德松等，〈「南方開發の研究」座談會〉，《新亞細亞》4卷4號，1942年4月，頁54-81。

^② 坂本德松，《南方文化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2年，頁192。

第三、台北帝大的研究規模有限，不足以涵括各項問題。

是以台北帝大的學術研究對象和內容，在 1930 年代後半期起因應國家局勢對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事情的認知需要，逐漸調整。而「南方研究」由原先學術體制中的研究焦點之一，在時局的演變之下，邁入 1940 年代之後，成為學術體制中的主要研究焦點。

自 1930 年代後半期起，台北帝大學者們因應 1937 年中日戰爭擴大和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局需要，成為學術動員對象，以學術報國的方式，著重「南方研究」。以下即就日本學術界的動態和台灣總督府政策，略述其時代背景。

一、日本學術界的動態

1937 年起中日戰爭的擴大，使日本的控制區域逐漸擴展，尤以中國中部和南部地區為最。日本學術界為因應「東亞建設」的目的，陸續派遣調查團進行各地的資源調查。諸如東京帝國大學柴田桂太、高橋基生、石原忍諸人分別對海南島進行農業和人類學調查，提供海南島產業開發的參考意見；對滿蒙興安區域進行原始林調查，提供農林計劃的參考意見；對滿蒙、中國北方進行有害昆蟲防治的調查^②。

迄至 1942 年 1 月起日本軍隊逐漸將東南亞地區置於控制之下，展開軍政統治。由於東南亞地區素以地下資源蘊藏豐富聞名，為使資源有效利用，提供軍事需要。因此 1942 年和 1943 年間為數眾多的日本動物學者、植物學者和地質學者被動員接收原屬美國、英國和荷蘭

^② 《台灣日日新報》14023 號，昭和 14 年（1939）4 月 1 日，〈海南島へ調査班/大陸へも科學挺身隊〉。

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②。另一方面衆多資源調查團也派遣至東南亞各地，進行資源的種類和分布調查。處於此種南方熱潮之下，日本本土的學者也展開南方的資源、衛生、生活等各範疇研究，形成所謂「南方科學」流行的現象^③。

二、台灣總督府的政策

1937年起台灣總督府因應中日戰爭的擴大和中央政府的南進政策，原先獨力進行的「南支南洋」措施也成爲國家政策實施的一環，使台灣總督府的角色，由區域性「南支南洋」政策的推動者，一轉爲全國性「南進」政策的地方協助者。處於此種局勢之下，台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也有所調整。原以中國南方福建和廣東地區爲重點的「南支南洋」政策，逐漸轉爲以東南亞地區爲重心的「南方」政策。即以1940年總督府因應國防國家體制而設立的府政調查會而言，其研擬的施政方案有五：統治機構的擴充、文教新體制的確立、經濟新體制的確立、國土計畫的樹立和南方政策的擴充^④。南方政策在國家方針之下，成爲施政重點之一。於是總督府的南方施策具體項目，在原有的文化、經濟、交通等措施擴充之外，更有外事部設置、南方人員養成機構設置、通信機構的整理、工業化、港灣設施運輸力的擴

② 譬如地質學者田中館秀三之例，參閱田中館秀三，《南方文化施設の接收》，東京：時代社，1944年。

③ 日本科學史學會編，《日本科學技術史大系第四卷·通史4》，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66年，頁408。

④ 《台灣日日新報》14620號，昭和15年（1940）11月23日，〈國防國家建設（府政調查會答申/五項目につき）〉。

充等等措施的新置^⑥。此種南方施策的擴充，乃是伴隨戰爭情勢演變的發展。就中戰爭協助項目中最迫切一事，即人力資源動員，支援軍事佔領地統治和其他業務的運作，諸如行政、經濟金融、治安、司法、交通通信、公共事業、新聞、文教、醫療防疫等事項^⑦。

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在此種南方發展的局勢之下，也邁向新階段。「南方研究」與其言是學院內研究，無寧更具有國家和社會需求的性質。台北帝大對時局的協助，一如其他大學的工作，以資源調查為主，其餘事項為輔。以下即就台北帝大學者對南方調查研究活動的面貌，擇要敘述：

1. 廣東地區為主的華南調查

1938 年 10 月日本軍隊攻取廣東之後，南支派遣軍為求廣州等地的復員建設工作，遂組成軍調查班，進行政治、文化等工作的調查^⑧。該調查班由南支調查會負責組成，以台北帝大理農學部（氣象學講座）教授白鳥勝義為團長，成員多為台灣總督府職員和台北帝大教授，另有南支調查會、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和台灣銀行等機構人員。至於台北帝大學者參與的原因，根據當時參與者之一小田俊郎的回憶，乃是憂心廣州中山大學等的文化設施所度藏的

⑥ 鹽見俊二，〈台灣における戰時財政の進展〉，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昭和十六年版台灣經濟年報》，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1 年，頁 759 - 760。

⑦ 參閱台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件ヲ對南方施策狀況（改訂版）〉，台北：台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 年。陳美蓉，〈日本南進過程中的台灣總督府——南洋篇（1895 - 1945）〉，《台灣風物》39 卷 3 期，1989 年 9 月，頁 51 - 72。

⑧ 不著撰人，〈南支調查會創立及行動經過報告書〉（1940 年），〈井上匡四郎文書・南支調查會關係文書（二）〉，國學院大學圖書館藏。

文獻和研究資料出現散逸的情景^②。該調查班的業務工作分為四方面進行，第一系負責「新政權助成的相關調查」；第二系負責「作戰資料資源調查」；第三系負責「貿易經濟的相關調查」；第四系負責「其他事項」^③。

其中台北帝大學者參與狀況^④，一如表 2：

表 2 台北帝大學者參與南支派遣軍調查班狀況

姓名	業務負責範圍	隸屬單位	備考
中井淳	法理哲學	第一系	
北山富久二郎	經濟學（華僑調查者）	第一系	
後藤一雄	植物生理學	第二系	
大野一月	農藝化學	第二系	農林專門部教授
小田俊郎	醫學（內科）	第二系	
富田雅次	醫化學	第二系	
市村毅	礦物岩石學	第二系、第四系	
澀谷常紀	農學		
根岸勉治	經營學	第三系	農林專門部教授
白鳥勝義	調查一般	第四系	

2. 海南島的調查活動

就台北帝大而言，海南島的學術調查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不僅是外在的南方施策協助事項，更是台北帝大本身向台灣以外地區進行大

② 小田俊郎，《醫學者・南船北馬——大學教授四十年の回想》，大阪：六月社，1964年，頁115。

③ 「調查班分擔」（原稿），《井上匡四郎文書・南支調查會關係文書（二）》，國學院大學圖書館藏。

④ 同前註。

規模學術調查的嚆矢。

1939年2月日本軍隊進駐海南島之後，4月即由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三省聯合會議實施行政統治。根據〈海南島政務暫定處理要綱〉，其方針為：

作戰實施和治安確保為重點，同時因應我國不足資源的急需，致力於重要資源的調查和獲得為目標^②。

重點置於治安維持和產業開發，其中產業開發更是海南島行政治理的重點^③，因此行政當局基於產業開發的目標，即陸續邀請官方、學術和民間等各式機構進行農業、林業、礦業等種種調查。台北帝大的海南島調查之行，即是在此種情勢之下展開。

台北帝大在海南島為日本所有之後，即有意對海南島進行學術調查的計畫，但因諸種原因和各種考量，延至1940年11月始成行，是為第一回海南島學術調查（1940年11月-1941年1月）。該回調查以理農學部的學者為主，故以天然資源開發的基礎調查研究為目標。因調查時間短暫，屬於預備調查性質^④。

調查團的組織區分為三班，即生物學班、農學班和地質學班。生物學班的主要成果為植物相和植物採集、湖泊的水質分析和浮游生物、蜻蛉類昆蟲、鼠類等等調查。農學班主要成果為農作物、土壤的

② 〈海南島政務暫定處理要綱〉〔昭和14年（1939）4月21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頁340。

③ 太田弘毅，〈海南島における海軍の産業開發〉，〈政治經濟史學〉199號，1982年12月，頁1-22。

④ 早坂一郎，〈緒言〉，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第壹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台北：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昭和17年（1942），頁1-2。

應用微生物研究、畜產、農業昆蟲學、林業、居民的食物、食物的應用微生物研究、人類學等等調查。地質學班的主要成果為地質學、地理學、礦物等等調查。

該回調查的部分研究內容，稍後對一般民衆公開介紹宣傳。緣於1941年2月熱帶農學會為宣傳台灣在戰時下所具有的重大科學意義，特地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辦以民衆為對象的公開演講會。演講會的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三部分即為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主要為土壤生產力、林業、昆蟲、家畜、種族等項目^⑤。

第二回海南島學術調查（1942年2月-3月）仍以理農學部的學者為主，且如同第一回調查團般，置重點於資源調查^⑥。調查團組織區分為三班，即經濟及民族關係班、理農學班和農藝化學班。經濟及民族關係班的主要成果為海南島的經濟狀況、回人和漢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寺廟信仰等等調查。理農學班則為海南島的氣象、農作物、森林、鼠類、農業昆蟲學等等調查。農藝化學班則為海南島的植物性纖維資源、單寧和油脂資源和糖業等等調查。

在台灣總督府對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的各种戰爭協助項目中，政治行政、宣撫宣傳、文教、醫療防疫、交通通信、公共事業等等，各地比比皆是，唯獨對海南島的產業調查和學術調查，可謂絕無僅有。台灣總督府在1942年初期向內閣提出戰爭協助概況報告之時，對此一學術關係調查內容是提供簡略敘述：

⑤ 演講會的其他內容為農學和化學，參閱《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21324號，昭和16年（1941）2月21日，〈專門家が陣頭に開く熱帯農學會講演會〉。

⑥ 青木文一郎，〈緒言〉，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台北帝國大學第貳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台北：台灣總督府外事部，昭和19年（1944），頁1。

台北帝國大學鑒於其設立的特殊使命，最近組織由生物學班……、農學班……、地質學班……三班構成的海南島學術調查隊，各自以約四十日的時間，自十一月月上旬起依序派遣。分別以生物學班、農學班和地質學班完成調查。再者該大學欲在同島（海南島）設置熱帶農林研究所和臨海實驗所，取得軍方當局的諒解，現今準備中。^⑦

台北帝大學者另有接受海南海軍特務部的委託而進行的調查活動，該調查活動的事項名稱爲「黎族及其環境調查」。調查的結果至少有四份報告書存世，皆使用「海南海軍特務部政務局第一調查室」的名義，彙輯爲「黎族及其環境調查中間報告」系列，而以謄寫版的方式刊行。作者、報告名稱等項目，列之如表 3：

表 3 1942 年台北帝大學者接受海南海軍特務部委託的相關調查報告

作者	報告名稱	刊行時間	備考
山本由松	海南島黎界ニ於ケル植物調査報告書	1942 年 5 月	第一輯
淺井惠倫	海南島黎族言語調査報告書	1942 年 5 月	第二輯
金關丈夫	海南漢族及ヒ黎族ノ體力比較ニ關スル調査報告書	1942 年 5 月	第三輯
原田五十吉	海南島ニ於ケル淡水魚調査報告書	1942 年 6 月	第五輯

該系列調查的動機和目的，欠缺史料佐證，詳情不得而知。整體而

⑦ 台灣總督府，《南支及海南島ニ對スル台灣總督府ノ協力概要》，昭和 17 年（1942）1 月，頁 24b - 25a。昭和 17 年（1942）2 月 4 日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齋藤樹致內閣書記官長，〈大東亞戰爭勃發後ニ於ケル台灣總督府ノ協力概況送付ニ關スル件〉，《公文雜纂》2A - 15 - 纂 2783，國立公文書館藏。

言，調查是以黎族居住地區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為重點^⑳，此與海南島產業開發所需的資源調查和勞動力運用等問題，有其暗合之處。

3. 外務省的協助調查

外務省在 1941 年基於某種緣由推動南方調查計畫之時，尋求各帝國大學方面的協助，台北帝大為被考量者之一。大學方面基於實情，且鑒於各學部的特色，經過充分考量之後，提出下列調查協助項目^㉑。

一、文政學部

- (1) 諸民族和民族問題
- (2) 文化工作問題
- (3) 財政、金融

二、理農學部

- (1) 資源對策
- (2) 農業經營問題
- (3) 農產物交流和市場問題

爾後外務省在全盤檢討之後，1941 年 11 月 5 日邀集北海道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和台北帝國大學等機構的學者而舉辦「南方調查會議」，台北帝大方面主要是由理農學部的奧田彥（農業經濟學）、素木得一

⑳ 山本由松視為植物資源的調查，參閱海南海軍特務部政務局第一調查室，《海南島黎界ニ於ケル植物調査報告書》，昭和 17 年（1942），序言。金關丈夫視為海南島未來工業對策上絕不可忽視的勞動力資源調查，參閱海南海軍特務部政務局第一調查室，《海南漢族及ヒ黎族ノ體力比較ニ關スル調査報告書》，昭和 17 年（1942），序言。

㉑ 昭和 16 年（1941）7 月 25 日台灣總督府外事部長蜂谷輝雄致外務省南洋局長，〈南方調査ニ對スル當地大學側ノ協力ニ關スル件〉，《外務省記錄》E-4-0-0-6-1（資源調查關係雜件・調査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昆蟲學）、濱口榮次郎（製糖化學）、澀谷常紀（作物學）和根岸勉治（植民學）等學者參加^④。

此一「南方調查會議」的實際內容因乏史料佐證，不克得知，但若由前述的調查協助項目和參加成員方面見之，則至少有植物資源調查、農業生產和利用等項目。

4. 西里伯斯（Celebes）島的調查計畫

西里伯斯島位於東南亞地區，現為印尼的領土之一，處於諸島嶼環圍之中，東鄰摩鹿加群島，西接婆羅洲，南向小巽他群島，北望菲律賓的民答那峨島，首府為孟加錫（Makassar）。1940 年代前半期太平洋戰爭期間，被劃分為海軍軍政地區。

1942 年台北帝大理農學部有對海軍軍政地區中西里伯斯島進行學術調查的計畫，其目的是：

欲對西里伯斯島動植物和礦物等自然資源進行調查，並對該島全盤性農業開發相關的理論和實際兩方面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④。

調查組織方面分為生物班、地質班、農業基本調查班、農業生產班、農產利用班。具體調查研究項目如下^④：

一、椰子和椰乾有關的綜合研究與今後問題。

④ 昭和 16 年（1941）10 月 16 日台灣總督府外事部長蜂谷輝雄致外務大臣，〈南方調查ニ關スル件〉，《外務省記錄》E-4-0-0-6-1（資源調查關係雜件・調查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④ 昭和 17 年（1942）10 月 14 日台北在勤海軍武官致海軍省軍務局長，〈「セレベス」島學術調查ニ關スル件照會〉，土井章主編，《昭和社會經濟史料集成》17 卷，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1992 年，頁 206 - 208。

④ 土井章，前引書，頁 212 - 213。

二、居民的食糧問題的研究。

三、纖維、作物、耕作問題等有關的綜合研究。

四、今後應開墾的農作物種類與利用加工有關的綜合研究

五、石油、煤炭、銑鐵、金、銀、鋁土礦、米、砂糖、橡膠、奎寧樹、茶、煙草、咖啡、油椰子、椰子樹、木棉、可可樹、胡椒、樹薯、古柯、硬質纖維、棉、大豆、落花生、肉荳蔻、樹膠、蓖麻、芳香油植物、魚藤、玉蜀黍等有關事項。

此一擬以資源調查為名而進行的學術調查計畫，因海軍對西里伯斯島急速開發之需而有調查團之派遣，及在該島預定設置 Makassar 研究所^④之故，遂為海軍所婉拒^⑤。

此一計劃雖不明其選擇西里伯斯島的動機和調查規劃的原始構想。若就資源調查項目而言，似以海南島調查經驗為本，活用台北帝大的人才，對海軍軍政地區的食糧增產等資源開發問題，提供實地調查所得的具體可行意見。

5. 其他調查

1943年初期間台北帝大因某種緣由組織各種調查團，其中文政學部成員進行中國和中南半島（越南、泰國）等地的調查，而理農學部和醫學部則進行菲律賓地區的調查。此等調查團的詳情，迄今未見

④ Makassar 研究所於 1943 年 2 月依令設立，乃是海軍軍政地區的唯一試驗研究機構，下設總務部、地質礦物部、農林水產部、熱帶衛生部、環境科學部和慣行調查部等部門，專門從事海軍軍政地區的統治和開發必要基本事項的調查和研究，及與此相關的諸種技術試驗。參閱太田弘毅，〈海軍軍政地域にあったマカッサル研究所〉，《政治經濟史學》300 號，1991 年 6 月，頁 61-80。

⑤ 昭和 17 年（1942）11 月 7 日海軍省南方政務部長致台北在勤海軍武官，〈「セレス」島學術調查ニ關スル件回答〉，土井章，前引書，1991 年 6 月，頁 332-333。

相關資料佐證，僅知文政學部有如表 4 的調查事項^④，而理農學部則是組成「比島資源調查班」，以濱口榮次郎教授為團長，對菲律賓地區進行各種資源調查^⑤。

表 4 1943 年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學者的中國、中南半島調查概況

職稱	姓名	調查項目	備考
教授	植松正	中國本土刑法學的研究	刑法刑事訴訟法講座
教授	福田良輔	中國本土國語普及程度	國語學國文學講座
助教授	後藤俊瑞	東洋哲學的相關研究調查	東洋哲學講座
教授	力丸慈圓	中國本土的民族心理學研究	心理學講座
助教授	藤澤苜		
教授	淺井惠倫	南方文化的相關研究調查	言語學講座
講師	秋永肇	越南、泰國的政治組織研究調查	政治學政治史講座
教授	中川正	越南、泰國的華僑經濟調查研究	商法講座
助教授	東嘉生		經濟學講座
囑託	小幡清金	越南、泰國的金融相關調查研究	

二、南方研究機構的開設

戰前日本的大學設置附屬研究所一事，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④ 《台灣日日新報》15440 號，昭和 18 年（1943）2 月 27 日，〈南方、支那の調査へ/台大教授ら續々出發〉。

⑤ 大野一月，〈台北時代〉，收入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周年記念誌編集委員會編，〈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1988 年，頁 54。

即有，但將研究活動正式展開之事，實始自 1931 年滿洲事變^{①⑦}。自 1931 年至 1945 年之間成立的各大學附屬研究所，一如表 5、表 6、表 7、表 8^{①⑧}，由諸表得知下述現象：

第一、總數 45 所研究所中，1939 年以前設置的大學附屬研究所數量有限，僅約 6% 左右，1939 年以後則逐漸增加，尤其是 1943 年和 1944 年的研究所數量合計高達約 44%，約近一半。

第二、總數 45 所研究所中，如按理工、醫學、農學和人文社會等類別區分，則知理工類研究所約 58%、醫學類研究所約 27%、農學類研究所約 6%、人文社會類研究所約 9%。

第三、以地域性名稱冠名的研究所有 8 所，其中以東亞冠名的研究所有 2 所，以大陸冠名的研究所有 1 所，以熱帶冠名的研究所有 2 所，以南方冠名的研究所有 3 所。其中熱帶或南方冠名的研究所中，理工類 2 所、醫學類 2 所、人文類 1 所，合計 5 所。此 5 所之中，有 4 所是在 1943 年之後設立

上述敘述所示現象有二：一為以理工類為主的大學附屬研究所的設立，實與時局的演變密切相關，特別是因應戰爭發展而逐漸成形的科學研究動員體制的影響。此一科學動員體制在國策之下，異常地擴張科學研究的範圍和內容，變相地擴充大學的研究設施和增加研究經費^{①⑨}。而在此一科學動員體制之下，研究所總數 64% 是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成立，表明戰爭協助必需的科學研究的孔急。另一

①⑦ 廣重徹，《科學の社會史——近代日本の科學體制》，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 年，頁 144。

①⑧ 廣重徹，前引書，頁 143、162、201。通商產業省編，《商工政策史》13 卷，東京：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79 年，頁 681。

①⑨ 廣重徹，前引書，頁 159-163。

表 5 1931 - 1938 年間設立的大學附屬研究所 (3 所)

設立年月	學校名稱	附屬研究所名稱
1931 年 11 月	九州帝國大學	溫泉治療學研究所
1934 年 3 月	東京工業大學	建築材料研究所
1934 年 9 月	大阪帝國大學	微生物病研究所

表 6 1939 - 1942 年間設立的大學附屬研究所 (17 所)

設立年月	學校名稱	附屬研究所名稱
1939 年 2 月	東京工業大學	資源化學研究所
1939 年 4 月	台北帝國大學	熱帶醫學研究所
1939 年 8 月	京都帝國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所
1939 年 8 月	東北帝國大學	農學研究所
1939 年 10 月	熊本醫科大學	體質醫學研究所
1939 年 11 月	大阪帝國大學	產業科學研究所
1939 年 12 月	東京工業大學	精密機械研究所
1941 年 3 月	京都帝國大學	結核研究所
1941 年 3 月	東北帝國大學	選礦製鍊研究所
1941 年 11 月	北海道帝國大學	低溫科學研究所
1941 年 11 月	東京帝國大學	東亞文化研究所
1941 年 11 月	京都帝國大學	工學研究所
1941 年 12 月	東北帝國大學	抗酸菌病研究所
1942 年 1 月	九州帝國大學	流體工學研究所
1942 年 3 月	金澤醫科大學	結核研究所
1942 年 3 月	長崎醫科大學	東亞風土病研究所
1942 年 5 月	京城帝國大學	高地療養研究所

表 7 1943 - 1945 年間設立的大學附屬研究所 (25 所)

設立年月	學校名稱	附屬研究所名稱
1943年2月	東京工業大學	窯業研究所
1943年2月	東北帝國大學	科學計測研究所
1943年2月	九州帝國大學	彈性工學研究所
1943年2月	北海道帝國大學	超短波研究所
1943年2月	北海道帝國大學	觸媒研究所
1943年2月	名古屋帝國大學	航空醫學研究所
1943年3月	台北帝國大學	南方人文研究所
1943年3月	台北帝國大學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
1943年10月	東北帝國大學	高速力學研究所
1943年12月	岡山醫科大學	放射能泉研究所
1944年1月	東北帝國大學	電氣通信研究所
1944年1月	東北帝國大學	非水溶液化學研究所
1944年1月	大阪帝國大學	音響科學研究所
1944年1月	東京帝國大學	南方自然科學研究所
1944年1月	東京工業大學	電子工學研究所
1944年5月	京都帝國大學	木材研究所
1944年5月	九州帝國大學	木材研究所
1944年8月	東京工業大學	燃料科學研究所
1944年8月	廣島文理科大學	理論物理學研究所
1944年8月	神戶商科大學	經營機械化研究所
1945年1月	東北帝國大學	硝子研究所
1945年1月	東京帝國大學	輻射線化學研究所
1945年1月	九州帝國大學	活材工學研究所
1945年6月	京城帝國大學	大陸資源科學研究所
1945年6月	九州帝國大學	熱帶傳染病研究所

表 8 1931 - 1945 年間大學附屬研究所專門研究的類別構成

年 度	理	工	醫	農	人文社會	合 計
1931			1			1
1932						0
1933						0
1934		1	1			2
1935						0
1936						0
1937						0
1938						0
1939	1	2	2	1	1	7
1940						0
1941	1	2	2		1	6
1942		1	3			4
1943	2	5	2		1	10
1944	4	3		2	1	10
1945	2	2	1			5
合計	10	16	12	3	4	45

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南方或熱帶研究之類大學附屬研究所的集中性出現。緣於 1942 年日本以軍事行動將東南亞各地置於控制之後，驀然出現一股「南方研究」的風潮。即因應南方資源的調查開發和研究利用，不僅派遣學者接管原屬英國、美國和荷蘭等國的農業、林業

等研究機構，更以調查團組織的方式四處探查未開發的地下資源。日本本土的學者也為探討南方植物資源、風土病和日本人的南方適應等等問題，組成各種研究委員會和設置相關研究機構^⑤。

處於南方研究和科學動員研究的雙重需求的時勢和戰局之下，位於南進據點台灣的台北帝大也在 1943 年增設附屬研究所，專責處理南方事物研究。

因此台北帝大增設研究所一事^⑥，顯然並非基於大學自身的南方學術研究發展計畫和內部研究需求而呼籲的聲音^⑦，無寧是因應南方調查研究的時局需要和活用大學的學術研究資源等外在壓力始出現。此由研究所的設立乃是台灣總督府 1942 年南方協助政策的項目之一^⑧，且費用撥自南方施策經費，列入 1942 年度新增經費項目中一事^⑨，即可得知。

台北帝國大學增設的研究機構，一為以文政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人文研究所，一為以農學部和理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以下即就相關事項，予以敘述：

1. 南方人文研究所

⑤ 廣重徹，前引書，頁 200 - 202。

⑥ 台北帝國大學在 1939 年 4 月有附屬的熱帶醫學研究所，乃緣於中央研究所解體，其中衛生部擴大為熱帶醫學研究所，併入台北帝國大學。故就台北帝國大學的發展演變而言，熱帶醫學研究所實難言是新增設機構。

⑦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自今村完道學部長時代（1934 - 1937）起即有設立附屬研究機構的聲音出現。參閱《台灣日日新報》15460 號，昭和 18 年（1943）3 月 19 日，〈磐石の基礎固めん/初代所長抱負を語る〉。

⑧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昭和 17 年（1942）4 卷，〈昭和十七、十八年度重要方策ニ關スル件〉，編號 12174。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藏。

⑨ 天延旭，〈財政〉，收入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昭和十七年版台灣經濟年報》，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2 年，頁 320。南方人文研究所的設立經費為 7 萬 5 千圓，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的設立經費為 21 萬 5 千圓，合計為 29 萬圓，約為該年度預算的 3.8%。

1943年3月南方人文研究所設立，職掌依官制為「南方諸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關研究」。^⑤基於此一目標，研究所之下設置第一部和第二部分掌其事，其中第一部所掌事務為：一、政治和法制的相關調查研究，二、財政和經濟的相關調查研究；第二部所掌事務為：一、文化的相關調查研究，二、民族的相關調查研究^⑥。首任所長為移川子之藏，第一部部長為小幡清金，第二部部長為久野芳隆^⑦。

基於上述的調查研究方向和範圍，研究所鑒於時局實情而擬定的主要調查方針為^⑧：

- 第一、對南方（南支·南洋）諸民族的統治機構、經濟組織、民族系統、習慣法、心理、語言、宗教、歷史、教育及其他一般文化等，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
- 第二、對國家永久對策有助益的南方人文科學，進行基本研究，且實行與大東亞戰爭有直接必要關係的實際調查，以此協助民生安定和治安確保方面的企畫。
- 第三、與軍政調查部和大東亞省直屬的各地文化會館及其他南方調查機構，保持密切連繫，勿使研究有所遺漏。
- 第四、調查研究之時，特別考量①以往的狀態；②從大東亞戰爭爆發時至今的演變和現狀；③未來的動向。

^⑤ 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要覽》，台北：南方人文研究所，1943年9月，頁1。該資料之得見，承蒙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李文良先生之協助，謹致謝忱。

^⑥ 南方人文研究所，前引書，頁2-3。

^⑦ 〈敘任及辭令〉，《學內通報》317號，1943年8月15日，頁3。

^⑧ 南方人文研究所，前引書，頁5-6。

第五、地區方面，分為陸軍軍政地區、海軍軍政地區和大東亞省直轄地區等三大地區實施調查，同時對這些地區進行比較綜合，明瞭其特異性、類似性和關聯性。

至於具體的調查研究項目，茲以昭和十八年度（1943）為例^⑨，列之如表9。

具體研究成果的有無，目前欠缺資料印證。其中移川子之藏、淺井惠倫、岩生成一、箭內健次、秋永肇、馬淵東一、久野芳隆諸人實賡續個人的研究領域，其餘人等則自個人專業研究項目延展至南方研究領域。此種情形無寧表示「南方研究」成為時局下學術研究動員的主要方向，因此集中大量人力進行此一範疇的調查研究，期能短期迅速獲得研究成果。

關於該所的活動情形，目前僅知移川子之藏、久野芳隆和馬淵東一三人以海軍省囑託身份參與1943年2月設立的西里伯斯島 Makassar 研究所慣行調查部^⑩開設事務，移川子之藏且至該島磋商事務，確立研究調查大綱^⑪，但人類學調查之責卻由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科出身的高主武三主其事^⑫。該調查何以非由南方人文研究所的人員實施進行，至今不明箇中原因。

⑨ 南方人文研究所，前引書，頁12-14。

⑩ 慣行調查的工作，即是原住民族的風俗習慣調查。海軍的軍政方針中，對行政區域的原住民族採取不干涉原則，尊重其風俗、習慣和宗教，以求迅速安定人心。參閱〈占領地軍政處理要綱〉，昭和17年（1942）3月14日，早稻田大學大隈記念社會科學研究所編，〈インドネシアにおける日本軍政の研究〉，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59年，頁543。

⑪ 《南方民族》7卷1、2號，1943年12月，頁133。

⑫ 日本人類學會編，〈人類學の概觀（1940-1945）〉，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54年，頁1。1939年設立的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科的研究重心置於自然人類學，與台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有所差異。參閱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通史二〉，東京：東京大學，1985年，頁725。

表 9 1943 年南方人文研究所調查研究案

所屬講座	調查者	研究項目	備考
	小幡清金	原住民商業交易習俗	專任所員
	久野芳隆	南方圈諸民族的宗教習俗 (特別是峇里島)	專任所員
	馬淵東一	南方圈慣習法的研究	專任所員
政治學政治史	山下康雄	南方統治制度	研究囑託
政治學政治史	秋永肇	安南行政組織的研究	研究囑託
行政法	園部敏	新外地統制法制的基礎研究	兼任所員
		印度的行政大綱	
經濟學	楠井隆三	西里伯斯島原住民的經濟習俗	兼任所員
		南方圈的移居殖民研究	
經濟學	今西庄次郎	台灣產業和南方圈產業的關聯	兼任所員
經濟學	吉武昌男	原住民的農業經濟調查	兼任所員
經濟學	東嘉生	南方地區華僑和原住民農業的經濟關係	兼任所員
土俗學人種學	移川子之藏	南方圈民族系統和慣習的相關研究	兼任所員
教育學史	伊藤猷典	日本語、日本精神普及的相關綜合研究	兼任所員
		教育制度的調查	
心理學	力丸慈圓	南方民族感覺特性的研究	兼任所員
		熱帶氣候對移居國人的效率影響的研究	
心理學	藤澤祐	南方民族心理的相關研究	兼任所員
言語學	淺井惠倫	印尼共通語馬來語的一般妥當性研究及其改良案探討	兼任所員
東洋文學	神田喜一郎	安南研究資料的蒐集和調查	兼任所員
東洋史學	桑田六郎	南方地區史蹟的相關研究	兼任所員
南洋史學	岩生成一	日本人南方移民發展史的研究	兼任所員
南洋史學	箭內健次	菲律賓島基督教會所轄之史的研究	兼任所員

南方人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一為機關刊物《南方人文研究所彙報》的發行，次為單行本的出版。目前所知有下列出版品問世：

- * 楠井隆三，《戰時台灣經濟論》，昭和19年（1944）11月
- * 南方人文研究所，《西南太平洋諸民族の食生活》，昭和19年（1944）12月
- * 桑田六郎，《三佛齊考 附補考》，昭和20年（1945）5月（南方人文研究所論叢第一輯）

其中楠井隆三和桑田六郎的著作，實是個人長期予以關心主題的研究成果，難言是在該所的大研究方針和計畫之下進行的研究成果。因此該所計畫之下的研究成果，似僅有《西南太平洋諸民族の食生活》一書。由該書的撰成目的，或能得見南方人文研究所的些許研究面貌。

此書以謄寫版型式問世，並未公開刊行^③。該書撰述的表面理由雖是南方區域的民族：

以何種食物為主食和副食而攝取？且如何獲得、貯藏和調理食物？此等事情的認識，對日本人而言，即將在該地出入自行攝取食物，且與當地諸民族建立諸種親睦關係，正是不可或缺之事。^④

乍見之下，似為某種應用目的而進行編撰工作，但究其本質，則仍以民族學研究為取向。諸如西南太平洋諸民族：

生活基礎在食生活一事，各處皆同。渠等日常生活幾乎全然為關

③ 筆者所見原本，原屬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海洋動物學者平坂恭介所有書籍，藏書編號5773。

④ 南方人文研究所，《西南太平洋諸民族の食生活》，台北：南方人文研究所，昭和19年（1944），緒言，頁1。

於食物的獲得和消費，即使渠等極為重視的祭祀，也同時意味著饗宴和飽食。菲律賓人、美拉尼西亞人、巴布亞人諸族之間，饗宴之時能提供最豐盛食物者，即博得最高的社會地位和尊敬。若言南方諸民族的一切喜樂悲哀，實質上是與食物相繫，並非過言。^⑤

諸語，即有民族學研究意味存在。此種訊息無寧顯示表裡二層意義，表面即如前述調查方針所示，在戰爭協力原則之下所進行的研究調查動員，實質則為在學術研究意涵之下所進行南洋地區的民族學研究^⑥。此種現象顯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二者相互結合，一方面學者因應時局的需求，調查南方民族實態，提供行政統治或其他目的參考資料，另一方面學者則在學術動員的名義之下，擴大自身在南方研究領域的範圍和深度。

移川子之藏選擇以飲食生活為題所進行的研究，非因太平洋戰爭之需，實則其來有自。移川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 1940 年 3 月曾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一短文，略述各民族飲食習慣的差異^⑦。此一短文的存在，得以認知學術研究和時局協力之間予以均衡處理的事實，亦即在戰爭動員的限制條件之下，如何進行學術研究。

^⑤ 同前註。

^⑥ 南方人文研究所所長移川子之藏當時雖以南方民族文化研究聞名，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由於經費、人員等限制，全以台灣一島為研究場域，未克對東南亞地區的民族、文化進行研究。筆者以為時局的需求和南方人文研究所的設立，適巧使移川子之藏能將研究場域由台灣移向東南亞地區，一償個人宿願。移川子之藏的學問特色介紹，參閱國分直一，〈移川子之藏——南方民族文化研究のバイオニア〉，綾部恆雄編著，《文化人類學群像 3——日本編》，京都：アカデミア出版會，1988 年，頁 167 - 190。

^⑦ 移川子之藏，〈民族と飲食物〉，《朝日新聞》19365 號，昭和 15 年（1940）3 月 1 日。

該書所顯示的研究地區，主要以婆羅洲、爪哇以東，即新華萊士線 (Neo - Wallace's Line) 以東諸島為範圍。此等地區又細分為八大地區處理，即是菲律賓、西理伯斯和摩鹿加群島、小巽他群島、新幾內亞、澳洲北部、所羅門群島、俾斯麥群島和內南洋 (密克羅尼西亞)^⑧。絕大部分地區恰為海軍軍政地區，此種原因或許有二，一為所長移川子之藏乃海軍省囑託之故^⑨；二為該地區所謂未開化少數民族居多。

2.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

1943年3月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設立，職掌依官制為「南方諸地域天然資源相關的科學式調查研究^⑩」。基於此一目標，研究所下置第一部、第二部、實驗所和庶務係等部門分掌其事。其中第一部負責「農林作物和家畜方面的改良、增產及新品種的育成等相關農學的研究和調查」。第二部則負責「農林資源方面的加工和製造等相關農藝化學的研究和調查」。實驗所則負責「現地資源的相關實驗和調查」^⑪。首任所長為濱口榮次郎，第一部部長為後藤一雄，第二部部長為馬場為二^⑫，實驗所所長則為平坂恭介。實驗所位於海南島榆林，主要研究事項為^⑬：

⑧ 同註④。

⑨ 移川子之藏接受某單位的委託，進行南方各地區當地居民生活實態的調查研究一事，當時的新聞有所報導。參閱《台灣日日新報》15807號，昭和19年(1944)3月2日，〈南方建設工作の一部門/學術調查研究/敢闘する南方人文研究所〉。

⑩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官制〉，《學內通報》308號，1943年3月31日，頁1。

⑪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事務分掌規程〉，《學內通報》309號，1943年4月15日，頁1。

⑫ 〈絃任及辭令〉，《學內通報》317號，1943年8月15日，頁3。

⑬ 〈研究動員情報〉，《科學技術動員》3卷2號，1944年1月，頁27-28。

第一、海南島地方維持和增進的相關綜合研究；

第二、海南島食糧增產的綜合研究；

第三、海南島海洋有害動物的研究。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創立之初的暫定研究項目，第一部為棉和纖維；第二部為燃料用酒精類和溶劑的分析研究，轄下的實驗所則是進行海南島的熱帶農作物、食糧生產率、病蟲害和海洋有害動物等相關的實驗研究^⑭。

爾後因應戰爭緊急需要而出現的科學研究動員和南方資源研究，遂使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在 1944 年 7 月增設第三部，職掌為「一、天然資源相關的理化學的研究和調查；二、天然資源相關的地質學和礦物學的研究和調查。」初期主要研究項目為南方石油精密分析的相關研究^⑮，以潤滑油和燃料的實驗為主^⑯。

固然台北帝大在 1928 年成立之後，標榜南方研究，且有成效著稱為世。但對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的大規模研究，則在 1938 年中國南方局勢變動以後形成。綜觀台北帝大的南方調查活動和研究機構的開設，可稱為大學當局在時局形勢之下，以學術動員的方式，因應南方國策的措施之一。且中國南方等地的調查活動，全然是自給自活或資源開發的方針之下，與該地的資源利用有關。此一時期的研究活動，非如 1937 年之前以台灣事物為主要對象，在國策的要求之下，

^⑭ 昭和 18 年（1943）3 月 15 日，〈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官制ヲ定ム〉，《公文類聚》2A-12-類 2708，國立公文書館藏。〈台灣日日新報〉15460 號，昭和 18 年（1943）3 月 19 日，〈人文自然兩面から研究/安藤總長經綸を語る〉。

^⑮ 昭和 19 年（1944）7 月 1 日，〈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官制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2A-13-類 2824，國立公文書館藏。

^⑯ 藤井一，〈台大受難記抄〉，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周年記念誌編集委員會編，《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1988 年，頁 190。

東南亞地區事物取而代之，成為與時代動向契合的研究重心和對象。

肆、「南方研究」的應用

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成果，向在學界之間流通。迄至 1940 年代初「南進」國策確立之後，南方研究備受重視，成為官府和社會之間對未來發展具有參考價值的必備知識。學院的研究成果，伸展至社會，貢獻其學術能量和社會價值。以下即就「南方研究」的社會價值，略述其應用事項。

一、南方施政的意見參考

台灣總督府為因應 1941 年 12 月上旬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的新局勢，1942 年 1 月 6 日召開部局長會議，會商南方建設的協助方式^①。16 日長谷川清總督邀請台北帝大學者在總督官邸召開臨時特別講座，以為南方政策構思的參考。演講者分別就南方的相關領域事項，發表見解^②。

職 稱	姓 名	題 目	備 考
助教授	北山富久二郎	南方的政治、經濟	經濟學講座
教授	平坂恭介	南方的海洋資源	動物學講座
教授	森下薰	南方的瘧疾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衛生學講座

① 《台灣日日新報》15027 號，昭和 17 年（1942）1 月 7 日，〈南方の新建設へ/台灣の協力方途/督府局部長會議で協議〉。

② 《台灣日日新報》15037 號，昭和 17 年（1942）1 月 17 日，〈學界の權威者に/新構想を聴く會/きのふ總督官邸に特別講座〉。

稍後在 21 日齋藤樹總務長官也邀集台北帝大的安藤正次總長、移川子之藏文政學部長、素木得一理農學部長、富田雅次醫學部長諸人，以及總督府殖產局長、企畫部長、文教局長、專賣局長等一級主管在辦公室舉行懇談會，討論南方經營相關的新構想⁷⁹。

此一現象無異顯示台北帝大長期進行的南方研究，在「南進」國策之下，已非純然的學院式研究，反而躍出學院的樊籬，俄然成爲具有應用意味的政策諮詢事項。

二、南方知識的整理出版

1. 南方大系

台灣總督府在 1943 年 8 月決定刊行《南方大系》大叢書，且自 1943 年度起列爲三個年度計畫事業。此一雄大計畫的目的，一爲台灣施政五十週年記念事業之一，另一爲活用台灣的特殊地位，使最具權威的南方資訊能成爲未來對南方施政政策的基礎資料⁸⁰。

此一計劃由南方委員會擔負其責，因此在該委員會之下設置南方大系委員會（委員長總務長官）、南方大系編纂委員會（委員長外事部長）和南方大系刊行委員會（委員長外事部長）等三委員會推動其事。其中最關事情成敗者，莫如南方大系編纂委員會。此一委員會的成員中，台北帝大的學者即過其半。其構成如表 10：

⁷⁹ 《台灣日日新報》15042 號，昭和 17 年（1942）1 月 22 日，〈南方施策新構想へ/台大的研究を聴く/齋藤長官懇談會を開く〉。

⁸⁰ 《台灣日日新報》15596 號，昭和 18 年（1943）8 月 3 日，〈南方施策への基礎資料/「南方大系」刊行決定/南方圈實地調査をも實施〉。

表 10 《南方大系》編纂委員背景分析

機 構 類 別	人 數	比 例%
總督府行政機構	11	26. 2
總督府研究試驗機構	6	14. 3
台北帝國大學	22	52. 4
民間單位	3	7. 1
合計	42	100. 0

此種組成結構，顯示總督府方面雖因政策之故，蒐集南方資料有年，但論南方研究之本質，則台北帝大在項目和人數方面，已凌駕總督府的研究機構而居其首位。因此南方知識的整理過程中，台北帝大成爲不可或缺之單位。

該鉅大工程當時雖有進行，但以戰爭日漸激烈，物資極度缺乏，終無問世之日^①。

2. 熱帶科學研究叢書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以地理位置和發展方針之故，台灣不僅被視爲南方研究的中心，也爲南方知識的寶庫。因此財團法人國際日本協會鑑於熱帶地區自然和生活相關的科學研究，向來主要以台灣學界爲中心，故自 1942 年 7 月起與台灣的學者合作，聘爲編輯委員，擬將台灣學界的熱帶科學研究成果，彙輯爲叢書，逐冊出版，名爲《熱帶科學研究叢書》，提供大東亞地區建設的參考^②。編輯委員 13 名中，台北帝大學者即有 7 名、總督府研究試驗機構成員有 5 名（其中

① 此依據當時台北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土木學講座教授牧隆泰的回憶，參閱牧隆泰，《農業土木に生きた八十年誌》，東京：著者，1971 年，頁 141。

② 〈「熱帶科學研究叢書」刊行趣意〉，《國際評論》7 卷 12 號，1942 年 12 月，頁 20-22。

1 名兼任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教授)、總督府行政機構人員 1 名 (文教局長)、民間單位 1 名 (南方資料館館長)^③。

由此一事得見台北帝大在台灣的學術研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儼然是台灣的學術研究重鎮，且為熱帶學術研究中心。但此一熱帶科學知識推廣普及計畫，最終似乎流於計畫階段，未見任何成果出版。

此一時期的「南方研究」，無論是基於南方政策，或者軍政統治，或者資源調查，或者熱帶適應研究^④，成為時代的流行風潮。台北帝大的學術研究在時代潮流之下，成為望重一方的知識權威。此一知識權威的價值，在特殊的時空環境之下，或在總督府的施政參考方面，或在南方知識予以普及的意念方面，展現無遺。

五、結語

台北帝大的存在期間（1928 - 1945）雖屬短暫，但在有形的設備和無形的人才培育方面，卻為戰後改朝換代之下的國立台灣大學奠定基礎，成為台灣本土學術研究的起點，尤以醫學方面為最^⑤。

若是回顧其創設的目的，與其言是台灣本土學術研究的存在，無寧言乃是其時日本知識版圖中南方區域的學術研究而存在。台北帝大的學術研究方向，依據其學術定位理念，乃是就台灣的地理位置，被賦與南方文化研究的使命。此一南方文化研究的內容，就台北帝大學

③ 同前註。

④ 譬如文部省在 1942 年度撥下科學研究費進行「日本人在南方生活的科學研究」主題研究，醫學方面有耐暑能力和風土適應、熱帶營養、登革熱的接種和預防、瘧疾的接種和預防……等等研究項目。〈學界の歩み〉，《日新醫學》32 年 7 號，1943 年 7 月，頁 90。

⑤ 譬如蛇毒研究即其一例。參閱楊玉齡、羅時成，《台灣蛇毒傳奇——台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6 年。

術構成層面觀之，可分為自然科學方面的熱帶研究和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南方研究。如此設定的原因，就在於台灣的位置屬於日本帝國版圖的南方邊陲，且是熱帶領地^⑥。此一研究內容，正為日本內地各帝國大學的研究所欠缺，實可補足日本學術研究內容的範圍和深度。此一現象，雖可由學術分工的角度觀之，但就其創立的規模和設定的內容，實可謂殖民地學術。一如溫帶地區的美國、荷蘭等國曾經分別各自在菲律賓、印尼等地廣設研究機構，而有熱帶研究的學術成果出現。

即使有殖民地學術的景況出現，也因地理位置和資源之故，而產生不一的學術發展路徑。日本殖民地大學的發展，即存在有如此現象。試將台灣的台北帝國大學和韓國的京城帝國大學體制的發展大事予以並列比較，如表 11，或可一目了然^⑦。

以高等教育機構的角度觀之，培育專門人材的基本通識科目和專業項目，雖能等量齊觀，但以區域學術發展的角度觀之，發展的領域、順序、步驟等方面，出現大有不同之處。就個別存在的地理位置言之，或可謂因應風土人情的適宜發展，但就日本整體的學術發展言之，其區域特有的風土性研究，不免形成知識領域中學術分工的現象，亦即邊陲地區學術研究對象的對應發展和學術研究項目的設定分配，從而擴大學術研究領域，增加學術研究項目。

⑥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始有熱帶農學的實驗地。參閱《台灣日日新報》10066 號，昭和 3 年（1928）5 月 1 日，〈熱と光に恵まるる/熱帯農業の將來/台大理農學部の使命/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長大島金太郎〉。

⑦ 參考《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2 號，1997 年 4 月；京城帝國大學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誌編集委員會，〈紺碧遙かに——京城帝國大學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誌〉，東京：京城帝國大學同窓會，1974 年。

表 11 台北帝大與京城帝大學術體制發展比較大事記

年 月	台 北 帝 國 大 學	京 城 帝 國 大 學
1924 年 5 月		豫科設置
1926 年 4 月		正式設立，下置法文學部（法律學科、政治學科、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和醫學部
1928 年 3 月	正式設立，下置文政學部（政學科、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和理農學部	
1936 年 1 月	醫學部增設，附設醫學專門部	
1939 年 4 月	附屬機構熱帶醫學研究所增設	
1940 年 12 月		理工學部增設
1941 年 4 月	豫科增設	
1942 年 5 月		附屬機構高地療養研究所增設
1943 年 3 月	附屬機構南方人文研究所和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增設	
1943 年 4 月	理農學部二分爲理學部和農學部	
1943 年 10 月	工學部增設	
1945 年 6 月		附屬機構大陸自然科學研究所增設

由於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具有學術分工的意味，1937 年以前的研究內容，可稱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獨樹一幟。但其南方研究的範圍，受限於學校的本質和規模，有其限度。然而自 1937 年起中日兩國的戰爭和南進等局勢的出現，使南方研究的面貌和規模有所調整變動。在時局的需要下，不僅研究體制有所調整，調查研究活動也隨之熱絡。此種調查活動雖是以戰爭協助方式進行，卻使台北帝大得有機會擴大、深化南方研究。「南方研究」成爲學術體制的主要研究重

心，以多種面貌和活動形式出現。此時台北帝大雖充分發揮其南方學術文化研究重鎮的性質，卻也遠離純粹學術研究範疇，展現其學術應用的社會色彩和價值。台北帝大成為國家政策推行的協助單位，由此出現南方施政的意見諮詢、海南島等地的調查、學術知識普及等等事項。

台北帝大自身固然以時局的變動之故，擴大學術研究的規模和應用程度。但 1941 年起「南進」成為國策之後，驀然之間政府和社會需要大量的南方知識和現況，台北帝大的人力和設施顯然不足以因應國家的整體需要，是以東南亞各地的重要調查活動，反而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之下，拱手讓於其他調查研究機構。諸如 1942 年以後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婆羅洲等東南亞各地的軍政調查，是由東亞研究所、三菱經濟研究所、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京商科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太平洋調查會等機構分派執行，進行種族、社會、經濟、宗教、風俗習慣、地下資源等各方面調查^⑧。處於此種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 - 1945）大東亞地區各地資源調查為眾家機構齊力參與的局勢之下，台北帝大原先對外而言的獨樹一幟的研究，成為眾鳥齊鳴的情景。

筆者囿於篇幅和資料之限制，在此僅能以集體活動的現象，顯示「南方研究」的方向和內容，拼湊時代圖像的某種面貌。至於「南方研究」與時推移的變化過程和內容等的探討，有待以移川子之藏、奧田彥、田中長三郎、森下薰等人在南方人文、熱帶農業、熱帶醫學等

^⑧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滿鐵調査部・東亞研究所・IPR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頁33-34。

範疇的業績為例，進行細膩的處理。此等人物的研究，俟諸他日。整體而言，台北帝大在戰時期的南方研究，基於大學的規模設施和學者的專業，約有下列諸種特色：

- 第一、戰爭協助層次的學術研究。
- 第二、農林業為主的資源調查層次的學術研究。
- 第三、自然科學為主，人文社會科學為輔的學術研究。
- 第四、學術動員層面的學術研究。
- 第五、高度社會應用性質的學術研究。
- 第六、政策諮詢和參考的學術研究。

此等研究特色產生的本質，揆其研究項目的緣由，則在學術研究分工、殖民地學術、南方熱帶等因素形塑其研究規模和範圍。

就當日的學術研究版圖觀之，台北帝大的南方研究成果，雖因設立理念的本質而有所限制，但也營造出其區域研究的地方特色，或可謂吊詭之事。此等研究和特色，雖對日本學界提供熱帶和南方等新研究領域的知識，也對台灣為中心的學術研究區位，創造新的里程碑，豐富其研究內涵。

※曩昔初稿承蒙李文良先生、高淑媛小姐撥冗提供寶貴意見指教，謹致由衷謝意。嗣後內容有所增刪修改，果有辭意表達欠清晰者，其責在筆者。